

# 玛莎·努斯鲍姆的同情论：争议、辨析与反思

## Martha Nussbaum's View on Compassion: Contr-oversies, Analysis and Ref lections

陈 芬 (Chen Fen) 苏 晖 (Su Hui)

**内容摘要：**同情论是美国当代伦理批评的代表性学者玛莎·努斯鲍姆情感伦理理论中极为关键而复杂的部分，她重视从同情的视角挖掘文学的道德功能，认为文学阅读能使读者对人物产生认同，并培养其同情心、提升道德。然而，努斯鲍姆认知主义指导下的同情论却饱受争议，其理论过于强调同情的认知性，这会导致对同情受阻的情况、读者和文本的互动模式以及阅读和做好人之间的关系等认识不足；其批评实践忽略文本特征和情境因素的情感认知，容易让人落入观念先行和普遍主义的泥淖。这些问题可能导致读者认同困难，进而阻碍了文学通过同情实现其道德目标。努斯鲍姆建立在认知主义基础上的同情论固然有其缺陷，但它凸显文学情感的教诲功能，减弱功利主义的破坏性，强调伦理责任和实际行动，展现了拒绝冷漠和虚无的人文立场。只有充分参与理论对话、加深对读者和文本互动方式的认识、尊重文本，以此改进认同模式，我们才能澄清同情的伦理价值，并在同情的指引下，真正实现文学阅读的道德功能。

**关键词：**玛莎·努斯鲍姆；认同；同情；文学阅读；道德功能

**作者简介：**陈芬，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加拿大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苏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欧美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系中央高校基金科研业务项目“东西方戏剧经典的伦理叙事研究”【项目编号：SK02072018-0324】及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资助项目“玛莎·努斯鲍姆文学伦理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Martha Nussbaum's View on Compassion: Controversies, Analysis and Reflections

**Abstract:** Compassion is a critical but most complicated part of the theory of emotion established by Martha Nussbaum,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thical criticism. With extensive accounts of the ethical value of literature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ssion, Nussbaum maintains that reading literature can help readers identify with the fictional characters, cultivate their compassion and raise their moral awareness. However, her view

of compassion based on cognitivism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Theoretically, overemphasis on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compassion would fail to reveal the cases when compassion fails, the way readers and texts reac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ing and being a good person. In critical practice, ignoring textual features and various situational factors would easily lead us to preconceptions and universalism. These problems would bring about failures of identification and thus thwart the moral mission of literature. Flawed as it is, Nussbaum's cognitive view of compassion highlights the moral function of literary emotions and her attempts to reduce the harm of utilitarianism through compassion are related to ethical responsibility and actions, displaying a humanistic stand against indifference and nihilism. Only when theoretical dialogues are fully carri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model is revised, the way readers and texts react is better understood, and literary texts are duly respected can we clarify the ethical values of compassion and truly approach the moral core of literature reading.

**Key words:** Martha Nussbaum; identification; compassion; literature reading; moral function

**Authors:** **Chen Fen** is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fields are Canadian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Judyjuly@126.com); **Su Hui**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European &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suhuichina@163.com).

美国伦理学家玛莎·努斯鲍姆 (Martha Nussbaum, 1947—) 围绕 “人应该怎样生活?” 这个问题展开对文学阅读道德功能的探讨, 她认为, 阅读文学作品能使读者与人物产生情感共鸣和认同感, 并培养读者的同情心、提升道德。她在其专著《思想的剧变: 情感的智性》(*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sup>1</sup>) 中结合大量文学作品详细阐述了认知主义的同情论, 并在多部著作中从同情的视角进行了文学批评实践。但同情作为努斯鲍姆情感伦理的一个关键词以及情感智性论最复杂的部分之一, 却备受争议。评论界从同情的伦理理论基础、同情与文学阅读道德功能的实现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质疑了努斯鲍姆的同情观。本文主要针对各种质疑, 对努斯鲍姆的同情观和相关批评实践进行辨析, 在去伪存真、广泛吸收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同情与文学阅读的道德功能间的关系。努斯鲍姆的同情观和由此展开的文学批评实践的确存在局限, 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如文本自身的

1 以下简称《思想的剧变》(*Upheavals*), 此书中的内容均为作者自译。

特征、读者和文本的互动方式、文本选择的多样性等，我们才能在同情的指引下，真正实现文学阅读的道德功能。

### 一、努斯鲍姆的同情论及相关批评实践

同情是努斯鲍姆情感伦理的关键词之一，也是她从事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视角。在以《思想的剧变：情感的智性》为代表的多部著作中，努斯鲍姆结合大量文学作品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同情论。

首先，努斯鲍姆对“同情”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努斯鲍姆的“同情”对应英文单词“compassion”，她将之与相关概念如“怜悯”（pity）、“移情”（empathy）和同样译为“同情”的“sympathy”进行了辨析。在她看来，怜悯带有对受难者屈尊降贵的色彩，移情是对他人体验的想象性重建，但不含有对这种体验的评价。“compassion”与“sympathy”意思接近，但比后者情感更强烈，受难者的苦难更深重（Nussbaum, *Upheavals* 300-301）。本文论及的同情既包括 compassion 所指的虚构人物或读者身上作为道德情感的同情心，又指读者与人物产生的情感共鸣和认同，后一层面上的同情更接近 sympathy 或 identification，它不单是道德情感，更是情感感召下的认知和伦理认同，能提升道德感。在相关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努斯鲍姆也主要是在这两个层面上讨论同情问题。

其次，努斯鲍姆对同情的认知结构及其与利他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她继承了斯多亚派“情感包含评价性判断”的观点并指出，同情的认知结构包含三个方面的认知因素，即受难者苦难深重、受难者无过错原则和同情者的幸福论判断（Nussbaum, *Upheavals* 320）。其中，前两个因素来自亚里士多德对同情的定义，而该定义中同情者感受到的“痛苦”<sup>1</sup>被替换为“同情者的幸福论判断”，即受难者是同情者的人生规划和目标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促进受难者的善也有助于同情者获得幸福。努斯鲍姆在同情的条件中排除了“痛苦”、“惊奇”等非认知因素，坚持认知论的同情观。她不仅指出了同情的认知结构，还分析了同情如何与伦理相关。同情关注的是“怎样培养、扩大并稳固那些已有的关怀因素，尤其是怎样建立对他人稳定的、真正的伦理关怀，因为他人也有需求、怨恨和愤怒”（Nussbaum, *Upheavals* 336）。同情让人走出自我的拘囿，去关心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生命，它是为了他人而产生的感情，因此含有伦理的因素。努斯鲍姆发现，虽然同情与利他主义的关联在理论上难以证明，但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证实这种关联的存在（Nussbaum, *Upheavals* 337-339）。认知是客观的、理性的，认知因素相同时，富于同情心的人更会积极地帮助其同情的对象。因此，同情不仅有利于同情者自身的幸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他的。

1 详见左稀：“论同情的充要条件——纳斯鲍姆同情观研究”，《道德与文明》2（2014）：60-68。

第三，努斯鲍姆分析了阻碍同情产生的诸种因素。努斯鲍姆比亚当·斯密更清楚同情的复杂性，对同情受阻的情况，她主要谈到两点：其一，从情感因素来说，羞耻、嫉妒和恶心是封闭型情感，会阻碍同情的产生。“同情比很多类型的爱都更能将自我的边界向外延伸，而其他一些情感却让人在自己周围筑起锐利的防护，免受外物污染”（Nussbaum, *Upheavals* 299）。为此，但丁都受到努斯鲍姆的批评。她提到但丁在《地狱篇》中差点因同情而晕倒，但后来他由于鄙视、厌恶犯罪者，心肠越来越硬。但丁对尘世的爱因为少了同情而受到损害（Nussbaum, *Upheavals* 587）。其二，社会差异或物种界限也会使同情受阻，“各种各样的社会差异，包括阶级、宗教、民族、性别、性向等都会限制想象力和情感。物种之间的界限对情感来说也是很难跨越的”（Nussbaum, *Upheavals* 316）。

第四，努斯鲍姆还对哲学史上有关“同情”的论争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在“同情的哲学之争”这一节中，努斯鲍姆梳理了哲学史上关于同情正反两派的观点。柏拉图主义认为同情意味着泛滥的情感和毫无反思的模仿，因而会损害理性；斯多亚派拒绝同情，因为他们认为同情本身与愤怒相关而有可能转为残酷，同情者软弱的心灵容易受到愤怒和仇恨的毒蛇的攻击；尼采将同情和软弱联系起来，视其为“仇恨的毒草得以生长的潮湿土壤”（Nussbaum, *Upheavals* 361）。与这些攻击同情的哲学家不同，亚当·斯密虽然也意识到同情的弊端，但他更多的是为同情进行辩护，他强调借助设身处地的想象去了解别人的感受，因为我们对此没有直接经验，他说：“对社会的车轮来说，作为优良光滑剂的美德，似乎必然使人愉快（……）同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看成一种自私的本性”（斯密 418-419）。努斯鲍姆在了解对同情的各种质疑并作出回应的基础上，也为同情进行辩护并指出：“同情是伦理生活的基石而不是非理性的糟糕向导”（Nussbaum, *Upheavals* 353）。努斯鲍姆的同情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她的同情论突出道德想象和对他者情感的理解和认同，同情就是站在他人的立场设身处地看问题，包含着对他人的认识和道德感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斯密的观点。“通过对他人生活经验的同情性想象，文学和情感能够让我们以最大同情的态度去拓展我们的生活和经验边界，能够帮助我们去除那些未经反思的歧视和仇恨，尽量作出真正负责任的群体评价，防止那些基于偏见的群体仇恨和群体歧视”（努斯鲍姆，《诗性正义》14）。同情要求有一种道德想象力，悲剧能激发同情心，读者通过想象拉近和遥远世界的距离，扩展对有价值的事物的认识，从而让人超越狭隘的自我，实现道德水平的提升。同情心是情感和伦理意义上的“共通感”，失去同情心，就失去了人性，纳粹失去对犹太人的同情和认同，就导致了种族大屠杀（Nussbaum, *Upheavals* 346-347）。

其二，努斯鲍姆持认知主义的同情论，认为同情受认知因素的影响，改

变认知就能改变同情，因而同情心能通过教育来培养和调节，进而超越自身的局限性。文学阅读就是培养人的同情心和想象力的重要途径，文学作品中的同情也就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这对斯密的观点是极大的推进。斯密将同情视为人类天然、原始的情感，他虽然也提及一些文学作品，但并没有深入探讨文学阅读中同情的伦理问题。他关注的主要是现实人际交往中的同情，其条件是受难者通过克制激情与同情者的看法和情感达成一致，因为没有克制的激情只会阻碍同情的产生。这种同情一般是令人愉悦的，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相比之下，努斯鲍姆对同情的认知更为复杂，也对该情感的可塑性和功能寄寓了更深的期待。需注意的是，努斯鲍姆并不主张读者盲目认同小说中的观点和思想倾向，她在《诗性正义》的前言中分析了移情的局限性。在充满偏见和仇恨的社会中，文学想象对于培养人的同情心并不总是奏效。

“文学想象是公共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我相信，如果提议用移情的想象来代替基于规则之治的道德推理，那将是极端危险的”（努斯鲍姆，《诗性正义》7）。不管怎样，努斯鲍姆依然对这一道德情感抱有厚望，她认为“光有同情远远不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指引我们走向道德的核心”（Nussbaum, *Upheavals* 390）。

其三，作为当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努斯鲍姆关注现实人生，反对沉溺于书本、反对只同情而不行动。她的同情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与伦理责任和实际行动密切相连，甚至能影响公共决策。文学情感常常被指责有审美化倾向，她依然为同情辩护，“希腊悲剧有将痛苦审美化的倾向，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中，受害者很少能获得救助和正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情本身有这种倾向”（Nussbaum, *Upheavals* 398）。

努斯鲍姆同情论的上述理论特色也基本贯穿于其围绕情感伦理展开的相关文学批评实践中。努斯鲍姆的批评实践不胜枚举，涉及的作品主要包括古希腊悲剧《阿伽门农》和《菲罗克忒忒斯》、亨利·詹姆斯的《金碗》和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马洛伊》、《马龙之死》、《无名的人》）等。对这些作品中的同情问题，她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学阅读的道德功能。

一是聚焦作品中影响某个人物伦理选择的情感反应，如人物情感想象力和同情心的缺失与否。在努斯鲍姆看来，除了意志和规则，我们还需要情感，她对两部古希腊悲剧的分析展现了剧中人物同情缺失时人性的泯灭，包含了对功利主义目的论的批判。阿伽门农迫于无奈献祭女儿以拯救舰队，但做出决定后他对女儿毫无同情怜悯之心，也没有尝试和命运去抗争，努斯鲍姆通过歌队的观察视角指出，这是违反人性的行为（努斯鲍姆，《善的脆弱性》51）。希腊神箭手菲罗克忒忒斯被蛇咬伤后被遗弃在荒岛，十年后，奥德修斯为了战争胜利才返岛将其带回（Nussbaum, *Upheavals* 303）。在努斯鲍姆看来，这两部悲剧中，被献祭的女儿和被遗弃在荒岛的菲罗克忒忒斯都仅被

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两部剧都通过歌队谴责了将领的冷酷无情。努斯鲍姆对《金碗》中价值冲突的分析，同样聚焦人物的道德感知力和同情问题，她充分肯定了梅吉在面对难以调节的伦理冲突时展现的道德感知和想象力，认为这使她走向了道德成熟。

二是从读者情感认同的角度来分析（此时的“同情”其实更接近“sympathy”和“identification”，而不是“compassion”），主要研究的作品是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努斯鲍姆认为作品中大量的内心独白即人物的单一声音很难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同，作品中对虚无世界的描绘以及传达出的内疚、恶心、悲观绝望等思想情感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她反对贝克特将死亡视为对原罪的惩罚而不是生命的自然状态，认为他对特定社会形式的强烈鄙视造成了小说中的绝望气息，他没有看到基督教之外的世界以及那个世界中人的自我表达，也没有看到有限人生的独特光辉。上帝之死并没有伤害所有人的情感生活，因此，贝克特的世界观依然是狭隘的、缺少普适性，很难让一些读者产生共鸣（Nussbaum, *Love's Knowledge* 309-310）。此外，努斯鲍姆对《安提戈涅》的分析也涉及读者同情问题。她认为该剧突出了克瑞翁代表的城邦利益和安提戈涅代表的家庭义务这两种价值追求之间的对立冲突，展现的是其中一种利益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时产生的悲剧。她指出，两位主角“对生活中重要事情的看法，都是单一和狭隘的。他们每个人所关心的东西，都向我们显示了另一个人拒绝接受的重要价值”（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98）。读者因而意识到安提戈涅美德的复杂性，她虽然处于弱势，但她敢于承认外在世界对美德的限制，这使她成为两个主角中更具有人类理性、思想更为丰富的那一个。即使有片面性，她依然是值得同情的。当提到读者为安提戈涅泪流满面时，努斯鲍姆指出：“如果我们总是要忍住眼泪，极力不让自己失控，我们往往就不能彻底地理解这部剧本。解读不单纯是沉静的理性活动，还包括情感上的反应”（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102）。

这些作品大多展现人物在复杂情境中面临冲突时的内心活动与选择，而努斯鲍姆认为读者既能凭借想象进入人物的内部视角，又能作为旁观者对人物表示同情。同情是对他人的感知力，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新的感知，让人获得灵动的同情心和道德知识，而不是僵化、片面的知识。“内心无声的感知活动本身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也是人类好生活的构成部分”（Nussbaum, *Love's Knowledge* 93）。同情也是伦理上的认同，是不可或缺的人性，是激发行动的重要情感因素。因此，阅读文学作品是提高人们的道德感知力、加强对有价值事物的认同、帮助人们获得真理和好生活的重要途径。

## 二、有关努斯鲍姆同情论的争议与辨析

努斯鲍姆的同情论及其对同情与文学阅读的道德功能之间关系的论述引发了评论界激烈的争议。很难将这些评论家们截然划归为正反两个阵营，

除了少数极端的反对派，他们大多是在指出努斯鲍姆观点的合理性之后，重点分析其中的弊端，并提出各自的改进方案。兼听则明，从这些支持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中，我们对努斯鲍姆的同情论能有更清晰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家包括拉特克利夫（Sophie Ratcliffe）、斯托（Simon Stow）、戴克（Tricia Van Dyk）、伊格尔斯顿（Robert Eaglestone）、多诺霍（Denis Donoghue）、哈珀姆（Geoffrey Galt Harpham）和凯茨（Diana Fritz Cates）。探讨努斯鲍姆对同情与文学阅读的道德功能之间关系的认识，首先要考察其同情论的伦理理论基础，其二是分析努斯鲍姆的读者认同论在认识同情与阅读的道德功能方面的功与过。

对努斯鲍姆同情论的伦理理论基础的质疑主要针对同情概念的片面性和同情的极端认知论倾向。在同情的概念上，努斯鲍姆的同情强调对他人体验的认知和理解。拉特克利夫指出，这忽略了伦理的神秘性，他人的苦难有时让我们感到震惊、几乎难以理解（Ratcliffe 18），因此同情的概念应该包括惊奇（wonder）和神秘。对同情概念的历史考察必须考虑我们面对其他世界和思想时情感的复杂性（Ratcliffe 20）。这与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的观念遥相呼应，代表了评论界对努斯鲍姆极端的情感认知论的不满。诚然，认知和情感紧密联系，但认知并不总能导致情感的产生，因为认知或价值判断往往并不单纯。“认知观需要的不仅是对事物的情感和价值判断的对等，还需要价值判断本身能代表对世界的纯粹的认知。但这很可疑，因为价值判断本身就表达了某种态度、立场和对事物的感觉”（Blackburn 38）。人们的认知或价值判断往往并不单纯，很难与情感对等。例如，努斯鲍姆同情论的认知结构中包含受难者无过错原则，且不说对受难者有无过错的判断本身可能会误导人，也很难说有过错者就一定不会引人同情。不过，努斯鲍姆在后期著作《政治情感：为何爱影响正义》（*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中，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无过错原则，认为该原则主要适用于成人的同情，而幼儿和动物的同情则不受此限。对于成人的罪过，人们可能在考虑具体情境后，依然对之怀有一定程度的同情（Nussbaum: 143-144）。

努斯鲍姆的认同论在认识同情与阅读的道德功能方面有何功与过呢？自由人文主义者的文学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认同”，包括移情和价值判断等认知活动，是努斯鲍姆的同情伦理及其在读者、人物和作者关系上的观点确立的基础，认同是确立阅读的道德功能的关键。然而，努斯鲍姆的读者认同论在认识认同的条件和对象、同情受阻的情况、读者和文本的互动模式以及阅读和做好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受到了多方抨击。

其一，努斯鲍姆的同情论强调对他者体验的模拟，模拟与认同都强调对人物的处境和体验的想象以及对作者意图的揣摩，模拟是阅读虚构作品时，确立积极的道德观的核心因素。文学阅读能让读者模拟遥远地方陌生人的体验，从而产生伦理认同，但模拟不仅需要条件、而且模拟对象也很成问题，

不能断言读者一定能通过想象来认同人物的情感。

模拟需要条件，文学作品不一定具备认同的充分条件。戈登指出：“在关系密切的社会中，人们共享大量的事实、规范和价值观，不需要太多模拟就能解释和预测身边人的行为。然而，在陌生的文化中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可能需要大量努力才行”（Gordon 164）。和生活中的模拟一样，文学中的认同，尤其是对陌生文化和陌生人的伦理认同也需要大量条件。

模拟的对象也可能导致认同失败。首先，它是虚构的，有时甚至是即兴创造出来的，在实际的阅读体验中，读者不一定能分享虚构他者的体验，很多评论家都反对夸大读者对虚构人物的情感认同。伊格尔斯顿认为：“与虚构人物产生情感认同的想法从批评和哲学的角度看，都令人怀疑”（Eagleton 46-47）。“我们从人物那里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努斯鲍姆总是无视文本特征进行她所谓的认知阅读。把人物当成真实的并与他们产生情感认同，这很天真、甚至危险”（Donoghue 146）。哈珀姆也持类似观点，但言辞过激：“她与文学和思想的关系看上去就是最原始的读者反应，即对虚构人物的同情（……）对努斯鲍姆来说，只要你在看小说，你就错不了”（Harpham 54-57）。其次，模拟对象不一定是“人”。拉特克利夫指出，“人物”（character）意味着较为鲜明、稳定的个性品质，而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经常只是某种“造物”（creature）。这些非人非兽、缺少天然同情心的造物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都更含混，代表了人类无法弃绝的原始本性和在本体论上对存在的焦虑（Ratcliffe 54-55）。努斯鲍姆的文学批评实践的确不大涉及非人类的造物。虽然造物一词神学色彩浓厚，但它触及到人类存在的多样性和同情的复杂性。面对这类文本和贝克特那种人物已经支离破碎的后现代文本，努斯鲍姆的同情论就可能失效。

上述争论其实涉及到同情受阻的情况，由于努斯鲍姆对这些情况并没有在批评实践中充分展开论述，这导致她对同情作为文学情感影响读者的方式分析不够全面，对同情和阅读的道德功能之间关系的论述不够严密。从自身出发不一定能达到了解他人的目的，因为难以摆脱的自我意识可能让我们最后又回到自身。例如，当自己的刻板印象作祟时，就很难通过模拟、想象对陌生文化产生认同。正如 W. H. 奥登所言：“艺术是一面镜子，每个人从中看到的是自己的脸”（qtd. in Mendelson 693）。列维纳斯也曾提到，西方哲学为了理解存在，有一种将他者简化为同一的倾向（Levinas 43）。“哲学史就像荷马史诗的奥德修斯，经过所有的漂泊，结果只是回到他的故乡”（qtd. in 金惠敏 47）。从这些比喻可以看出，同情有同化他者，将他者想象成另一个自我的嫌疑。

其二，努斯鲍姆的认同论在艺术与生活、阅读和做好人之间建立起直接、线性的因果联系，对读者和文本间复杂的互动方式、解构主义关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各种裂隙认识不足。以戴克和拉特克利夫为代表的评论家们批评了



努斯鲍姆的认同论，并借鉴不同的理论资源试图对之进行修正。

戴克在批评努斯鲍姆这种机械的因果模式时指出，对小说和道德哲学关系的建构需要借鉴阐释学对读者和作品互动方式的观点才更有说服力，人们与艺术作品间的互动模式应该是灵活、富于创造力、想象力的，而不是从作品到读者的机械、单向模式。她还借用苏伊德瓦尔特（Lambert Zuidervart）关于艺术真实和伦理责任的理论中“想象性呈现”（imaginative disclosure）的概念指出，让艺术实现“想象性呈现”就需要考虑艺术生产过程中的作者意图，艺术运用过程中的读者需求和艺术的内在规律（Dyk 209-211）。

拉特克利夫则参照认知理论在同情和认同问题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试图澄清和扩展认同模式。她将认同和“模拟”（simulation）与“理论论”（theory-theory）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认知活动联系起来（Ratcliffe 43）。其中，模拟与认同都强调对人物的处境和体验的想象以及对作者意图的揣摩，模拟是阅读虚构作品时，确立积极道德观的核心因素。对努斯鲍姆来说，模拟的可能性和对作者意图的了解都很关键，然而从读者想象跨越到对人物情感的认同不是一蹴而就的。“理论论”则体现了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认为读者每次都是带着自己的理论进行阅读，阅读并不能加深我们对其他思想的共鸣与理解，因为在阅读中，读者没有与人物或作者相遇，遇见的只是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人物只是读者通过理论能任意建构和解构的纸上符号（Ratcliffe 47）。这种思想其实已经渗透进上文评论家们对同情问题的批判之中，在奥登的镜子隐喻和列维纳斯关于奥德修斯出发又回到起点的隐喻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呼应。后结构主义对于批判传统道德批评中简单化的思想情感共鸣有积极作用，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我和他者交流的难度，但将人物视为纸上符号，企图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这种做法在文学的伦理转向中早已被摒弃。站在理论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在自由人文主义的“模拟”、“认同”与解构主义的“理论论”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努斯鲍姆的认同论被有些评论家指责为一种单向、机械的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忽略了各种裂隙。凯茨指出：“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思想和欲望（尽管二者相互交织），原因之一就是他的解释伦理判断和情感、欲望之间的裂隙”（Cates 332）。然而，努斯鲍姆忽略了这一区分，也因而忽略了认知和同情之间的裂隙。阅读文学能增进伦理意识，但不一定会引发同情，而且同情持续的时间可能很短，伦理意识和行动之间也可能断裂。

在认同论的指导下，努斯鲍姆的文学批评实践十分重视对同情的分析，其中不乏精彩独到的见解，但同情的诸多弊端也遭到评论界的反对。弊端之一是观念先行而忽略文本特征的倾向，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弊端是批评实践中聚焦单个人物而忽略众多情境因素，人物被解读为某种观念的化身，而文本特征、历史文化语境、读者的接受心理等情境因素被忽视。这些都会导致读者对人物认同困难，通过同情来提升道德想象力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努斯鲍姆在分析《金碗》中梅吉的道德感知时，上述两个弊端都存在，她对该小说伦理价值的理解从小说的叙事特征和读者接受这内外两个角度来看都存在不少争议。努斯鲍姆断言，梅吉通过对父亲设身处地的情感想象与认同走向道德成熟，但她在分析中仅聚焦梅吉一人的情感和叙事而忽略了整体叙事特征，这导致她对人物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和小说结局的多义性认识不足，也不利于读者对人物命运多种可能性的解读。梅吉生活在父亲用金钱为她打造的象牙塔中，她虽然渴望打破这个假象，和丈夫亚美利哥有完整的两性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却毫无平等可言。贫穷的亚美利哥和夏洛特在这个家庭中没有选择权，他俩在小说中被描述成笼中困兽、牵线木偶。结尾处亚美利哥抱着梅吉说的那句“现在，我的眼中只有你”，也可以理解为金钱捆绑下的僵局。努斯鲍姆充分肯定了梅吉面对伦理冲突时表现出的道德感知力、对秩序的追求和对生活的调整，但这样的调整无异于对他人命运的残酷操纵，说梅吉最后走向了道德成熟而无视其行为的残酷性是片面的。从读者接受讲，努斯鲍姆称赞梅吉时似乎忘了道德冲突随文化语境而变化。在重视孝道的中国文化中，做女儿与做妻子这两种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如此深刻的矛盾，女性为了丈夫而牺牲父亲的做法很难让读者产生伦理认同。即使在价值多元化的西方社会，这一做法也不一定能得到读者的认同，毕竟，读者接受心理受社会、文化现实条件的制约，忽略这些制约因素，既削弱对作品丰富性的理解，也难以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接受，努斯鲍姆理解的道德教诲就难以实现。

努斯鲍姆对《阿伽门农》中同情问题的分析十分精辟，评论界也很少提出质疑，但事实上，她在指责阿伽门农丧失了同情心、不人道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历史文化语境。从历史角度看，古希腊的英雄德性本来就排斥同情心，而阿伽门农出于战争考虑，只能根据比较原则做出选择，这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同情。就像奥德修斯为了战争而避开痛苦中的菲罗克忒忒斯那样，阿伽门农拒绝看被献祭的女儿也很可能是他唯一的选择。努斯鲍姆反对价值相对论和功利主义的比较，主张结合具体情境做出最好的选择，她根据已经变迁的时代语境，对古老文本进行新的解读，这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然而，在文本分析中脱离历史文化语境的倾向是不可取的，毕竟，人物难以超越历史。

努斯鲍姆的同情论在批评实践中还有普遍主义的倾向，因为同情强调人类心理上的共通感，要求作品能够回应人们普遍情感的声音和呼求。她认为，贝克特在小说三部曲中试图表现上帝死后西方人的恶心、绝望和孤独等情感，这很难引起世界上其它地方读者的共鸣。拉特克利夫对理解和同情的难度有更深刻的认识，她指出，努斯鲍姆没有仔细地听贝克特的声音，而贝克特所用典故的性质、他对戏剧独白形式的改编等都表明他对“思想和情感的分享”有更复杂的看法……贝克特一直关注“传达和听取另一个声音的难度”（Ratcliffe 171-172）。这一反驳让我们看到，文学展现独特的生命感和复杂、

多元的道德生活，普遍主义思想在解释人类情感时存在诸多谬误，我们不能将情感共鸣视为文学阅读实现其道德功能的必要条件。列维纳斯“绝对他者”的理念中，他者是无法完全理解的，道德就是尊重他者的“他者性”。西蒙·斯托（Simon Stow）也出于类似的原因反对努斯鲍姆的同情论，他认为努斯鲍姆的同情和道德想象在亚当·斯密那里就出了问题，我们不能把发挥想象力、站在他人的立场看问题当做是理所当然的，而努斯鲍姆以为白人中产阶级自然会同情社会底层（Stow 45）。这个批评是很中肯的，不排除努斯鲍姆有忽略主体差异、夸大道德想象功能的理想化倾向。从列维纳斯“绝对他者”的理念出发，所谓的设身处地就有同化他者的道德嫌疑。另外，如果同情的条件是自我能够对他者进行道德想象，那迥异于自我的他者很可能就得不到同情。可见，努斯鲍姆虽然意识到阶级、宗教、民族、文化等差异会限制想象力，使同情受阻，但遗憾的是，她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并没有深化该观点，有时甚至有所违背。评论界对努斯鲍姆文学批评实践的批评也主要是针对她对该观点的忽视。

评论界对努斯鲍姆的同情论不乏过激和不公正的评价，忽略了其思维的周密之处。以斯托为例，在他看来，阅读文学作品和读者产生同情、提升道德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道德想象甚至可以是破坏性的。“施虐者也可以很有想象力地去施虐，以他人的视角看世界也可以成为和他人对抗的最佳武器”（Stow 48）。努斯鲍姆其实已经说过：“施虐狂明白，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受害者遭受的痛苦很糟糕，但对施虐者而言，这痛苦是好事”（Nussbaum, *Upheavals* 322）。她清楚移情可以服务于自私的目的，它本身是有缺陷的，道德上中立。斯托试图质疑努斯鲍姆关于同情的幸福论断，即同情者把关心、同情他人的苦难与自身的幸福联系起来的认知判断，但他混淆了移情和同情。此外，斯托重视读者在阅读中的主动性，但他声称“二手的教诲没有任何作用（Stow 58）”，这流露出政治学家对文学批评的贬抑。努斯鲍姆的批评实践屡遭诟病的地方是她对《金碗》的分析，但肯定梅吉对他者的道德感知力这一主张其实有合理性。梅吉清楚自己的行为给亚美利哥和夏洛特带来的痛苦，她对他们不无同情心。“挥舞手中的权力总是残酷的，但他者的感知能减轻这种残酷性”（陈丽 166）。该观点填补了努斯鲍姆分析梅吉过程中的一个空缺，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梅吉同情感的伦理价值，对那些过激的反对之声无疑是一种反击和矫正。

### 三、对努斯鲍姆同情论的评价与反思

努斯鲍姆从同情这一人性化视角探讨文学阅读的道德功能，对大量文学作品做了精彩的解读，展现了拒绝冷漠和虚无、让世界回归真诚与爱的立场和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能提升促进人的道德能力。努斯鲍姆作为双重转向的先锋之一，她的文学研究模式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我们应该正视其

理论和批评实践的误区，并吸收可取之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就误区而言，努斯鲍姆的同情论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极端的认知论导致其伦理理论基础出现缺陷；批评实践中，她对具体情境包括文本特征和同情受阻的各种情况不够重视，因而出现了忽略生活和艺术的距离、片面夸大文学阅读的道德功能的理想化倾向。列维纳斯反对人们对艺术功能的看法太乐观，提醒人们光明与阴影和幕后的神秘共存（Levinas 30）。针对文学研究中见树不见林的弊端，穆雷·史密斯（Murray Smith）在谈到布莱希特传统时写道：“对小说移情式的情感反应使我们局限于单个人物的视角，从而阻止我们审视与其他人物和叙事全局的关系”（Smith 54-55）。努斯鲍姆虽然在理论上高度重视特殊情境中的各种因素，但她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确实有忽略文本细节，脱离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和读者接受心理的问题。

脱离历史文化语境的倾向固然不可取，但就积极面而言，努斯鲍姆敏锐地看到，功利主义指导下的比较原则对人的独特性以及内心深处的希望和恐惧视而不见，具有破坏性，因此她试图将比较原则纳入同情的伦理原则之中，以同情调和比较的破坏性，引导人们关注被遗忘者的生活。努斯鲍姆的同情论与其反对审美超越，承认人类共有的脆弱性和不完美现实的价值这一哲学立场有关。正如吉尔·拉尔森（Jil Larson）所指出的：“对苦难的畏惧和对审美慰藉的渴望会让人逃避他者之脸及他者对认同和同情的诉求”（Larson 99）。从心理学看，人类心理的连续性决定了情感认同的认知阅读模式有顽强的生命力，很多评论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穆雷·史密斯指出：“人物的概念在 20 世纪的作家和叙事学家手中都受到了抨击，但它依然在叙事话语中无处不在（……）人类主体的基本概念是我们日常社交和想象活动的基本元素，对虚构叙事的想象离不开人物”（Smith 17）。尽管有诸多不确定，“不可能消除所有固定的人物结构。完全没有崇高感和心理连续性的生活也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想象的’、‘不负责任的’的文学空间中，心理连续性也最终会重现”（Bersani 314）。自由人文主义者对同情的重视反映了人们对伦理认同的心理需求，“即便移情者所获得的心理内容与被移情者的原始心理内容不一致，那也要比那些通过以己度人的想象或自以为是的猜测而得到的心理内容真实得多，更要比那些对他人报以冷漠或鄙视，以至于连想象或猜测都懒得去做的人强上百倍”（李义天 20）。因此，从同情的角度挖掘文学作品给读者的伦理启示，这无疑是努斯鲍姆同情论的独特贡献。

改进同情论首先要改进认同模式，将认同建立在对综合情境的理解基础上。聂珍钊教授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聂珍钊 19）。具体到同情与文学阅读的道德功能的关系上，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同情在具体情境中受阻的情况、读者和文本及作

者互动时伦理认同产生的困难。文本的语言和叙事、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读者的文化接受心理和认知能力等广义上都是语境的组成部分，应该综合考虑。“与我们的情感体验更密切相关的不是对角色的认同，而是对情境的理解”（Ratcliffe 46）。对情境的综合考虑其实就是拉特克利夫倡导的“在自由人文主义和解构主义这两种认知模式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文化相对论“什么都行”的态度，避免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淖，发挥个体主动性去探寻作品的人文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尊重文本，并充分参与和各种同情论的对话，对同情受阻、沟通困难的情况有更深入的理解，为意义的不确定性留下应有的空间。在特殊情境下，要承认认同的困难，不可走极端的认知路线，因为认同困难本身也蕴含独特的伦理价值。

除了改进认同模式，努斯鲍姆的同情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还要在文本选择方面更具包容性并充分尊重文本自身的特点。努斯鲍姆在分析同情对人物的影响时，有时确实言之有据，其中包含的生活智慧也很有启发性。她认为，书中会描绘在现实生活中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物，这样的阅读能丰富我们对更多“有价值的事物”的认识（Nussbaum, *Upheavals* 2），但她选择的文本类型大多是有社会政治内容的主流现实主义小说和古典悲剧，对诗歌和后现代作品极少涉及。拉特克利夫在《论同情》中研究的文体主要是诗歌，她指出：“努斯鲍姆自己对有价值的事物的认识却不是很多，她对我们与文学文本的关系的看法很狭隘，她选择的文本也大都是现实主义作品”（Ratcliffe 16）。对于为什么努斯鲍姆很少关注其他文学形式，有评论家这样分析道：“其他文学形式可能颠覆认同和同情的纽带，并尝试展现不同的读者关系，因此，在努斯鲍姆对文学伦理的构想中，对这些文本可能性的探讨十分有限”（Wrighton 157）。的确，努斯鲍姆通过对贝克特的批判，表达其反对虚无荒诞思想、排斥后现代作品的态度，但这也极大地削弱了其同情论的阐释力和适用度，对同情和文学阅读的道德功能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亟需更复杂、文体更多样化的文本。此外，我们还应尊重文本自身的特点，明白艺术和生活的距离。这意味着不可脱离文本特征用预设的伦理观念去进行强制阐释，文学批评不是政治的竞技场，也不是个人阐发哲学主张的工具。

综上所述，努斯鲍姆的同情论和由此展开的批评实践有其独特的人文价值，但也存在不少局限。我们应该正视评论界的批评之声，在理论对话和批评实践中改进同情论，如改进认同模式、加深对读者和作品互动方式的认识、重视文本选择的多样性和文本自身的特征等。这些改进方案其实已经吸收了戴克所倡导的阐释学模式，该模式贯穿艺术的全过程，从作者意图、读者需求到艺术的内在规律。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澄清同情的伦理价值，并在同情的指引下，真正实现文学阅读的道德功能。

## Works Cited

- Bersani, Leo. *A Future for Astyanax*. London: Marion Boyars, 1976.
- Blackburn, Simon. "To Feel and Feel Not." *The New Republic* 24 Dec. (2001): 34-38.
- Cates, Diana Fritz. "Conceiving Emotions: Martha Nussbaum's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31.2 (2003): 325-341.
- 陈丽: 《亨利·詹姆斯的艺术道德观》。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 [Chen Li. *Art and Morality in Henry James's Writing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 Donoghue, Denis. *Ferocious Alphabet*. London: Faber, 1981.
- Dyk, Tricia Van. "Not Just Cause and Effect: Resituating Martha Nussbaum's Defense of Novels as Moral Philosophy in a Hermeneutical Framework."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19.2 (2017): 204-219.
- Eagleton, Robert. *Ethical Criticism: Reading after Levinas*. Edinburgh: Edinburgh UP, 1997.
- Gordon, Robert M. "Folk Psychology as Stimulation." *Mind & Language* 1.2 Summer (1986): 158-171.
- 金惠敏: "无限的他者——对列维纳斯一个核心概念的阅读", 《外国文学》3 (2003): 46-53。
- [Jin Huimin. "Infinite Otherness: An Interpretation of a Key Term of Levinas." *Foreign Literature* 3 (2003): 46-53.]
- Larson, Jil. *Ethics and Narrative in the English Novel, 188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4.
- Levinas, E. *Totality and Infin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London: Martinus Hijhoff Publishers, 1979.
- 李义天: "移情是美德伦理的充要条件吗——对迈克尔·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的分析与批评", 《道德与文明》2 (2018): 15-21。
- [Li Yitian. "Is Empathy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for Virtue Ethics? An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Michael Slote's Moral Sentimentalism." *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 2 (2018): 15-21.]
- Mendelson, Edward. *Early Auden, Later Auden: A Critical Biography*. Princeton UP, 2017.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玛莎·纳斯鲍姆: 《善的脆弱性: 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 徐向东 陆萌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年。
- [Nussbaum, Martha C.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Trans. Xu Xiangdong and Lu Me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8.]
- Nussbaum, Martha C. *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Oxford UP, 1990.
- 玛莎·努斯鲍姆: 《诗性正义: 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丁晓东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 [Nussbaum, Martha C.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Trans. Ding Xiaodong

etc. Beijing: Peking UP, 2010.]

—.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2013.

—.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1.

Ratcliffe, Sophie. *On Sympathy*. New York: Oxford UP, 2008.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rans. Jiang Ziqiang etc.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Smith, Murray. *Engaging Characters: Fiction, Emotion and the Cinema*. New York: Oxford UP, 1995.

Stow, Simon. *Republic of Readers? The Literary Turn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Analysis*. New York: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7.

Wrighton, John. "Reading Responsibly between Martha Nussbaum and Emmanuel Levinas: Towards a Textual Ethic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19.2 (2017): 149-170.